

王明言论选辑

人民出版社

P239/12

王明言论选辑

人民出版社

王明言论选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75印张 460,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000

书号 3001·1793 定价 2.00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曾经给党造成过严重的危害。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批判王明路线、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

本书选录了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王明的主要文章，共二十六篇。内容包括反映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文章以及讲话等。这些文章一律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写作时间不详的，则按出版年月编次。所收文章一般选取最初刊载的版本，未收到最早版本或作者重新发表时附有说明的，则选其中一种版本。凡有不同版本的文章，均互相参照进行校勘，除重要校勘作注解，一般订正错字、脱字、衍字都不注明。书末附有王明的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章、讲话目录，以便读者查阅。

本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余子道、黄美真负责编选。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1981年5月

目 录

《武装暴动》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1
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17
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33
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一九二九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38
论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2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45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	48
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	55
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	63
再论反富农问题(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68
——富农问题的严重	
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73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 ——二十四日)	100
——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	
怎样准备五卅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107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九三〇年秋冬).....	111
中国反帝运动的新高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268
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79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320
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383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	427
新形势与新政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470
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九三七年三月)	514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九日)	536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	
挽救时局的关键(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546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一月)	555
——在武汉大学讲演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566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一九 三八年十月二十日)	594
——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附录：王明文章、讲话目录	640

《武装暴动》的序言*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武装暴动》这本小册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的武装斗争的经验之结晶，它是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的武库，它阐明了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俄国两次——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的暴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暴动；德国两次——三月暴动与汉堡暴动；爱沙尼亚一次——涅维尔暴动；保加利亚一次——一九二三年九月暴动；中国四次——上海三次暴动及广东暴动)。它搜罗了二十三年(一九〇五至一九二八年)武装斗争的历史教训，它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于暴动问题的根本原则，同时，并揭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变节者——第二国际的领袖——对于暴动问题的可耻的曲解。它对于暴动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的问题，以及组织技术的问题，都曾给予一个明确的观念，它对于暴动有关联的各个问题都加以丰富深邃的阐明。因此，它对于每个共产主义的战斗员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我们很热烈的把这本小册子介绍给读者，我们希望它成为读者实行作战的指导，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每个共

* 《武装暴动》一书是发给党的“六大”代表阅读的参考资料。王明为它写了“序言”，曾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九年六月，《武装暴动》以《论艺术》的伪装封面在上海出版。这篇“序言”收入本书时，根据该书作了校勘。

产党员的责任，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所指出的中共目前的主要任务。

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动问题有联系的问题。

（一）关于第一点

一、巴黎公社的教训

巴黎公社的教训，在小册子中曾有时附带的说到，但必须补充两点：第一，关于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第二，关于占领银行。

暴动是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律是拚死的、勇敢的、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恩格斯）。未曾应用这个规律，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暴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国中部暴动时，“涅那威尔克”工厂区的暴动工人大曾把军事行动扩大到本区以外，广东暴动工人大曾设法向河南李福林部作拚死坚决的进攻，以致结果都遭受了失败。由此，可见不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暴动问题的这个主要原则，是许多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种毫无返顾的坚决的进攻并不仅限于军事政治的行动，经济上的进攻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即仅就占领银行一事举例来说吧：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暴动者占领银行的意义，未曾夺取存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巴黎银行，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广东的暴动者对于占领银

行一事也同样的作下了错误，他们不能取出银行的存款（打不开铁保险箱），来作为革命的急需，而将银行付之一炬。

二、总罢工与武装暴动

列宁主义者看待总罢工是武装暴动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暴动没有总罢工差不多一定要遭受失败。我们且举一件事实作例：莫斯科十二月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尼可涅夫斯基铁路（圣彼得堡至莫斯科铁路）未曾罢工，以致毒把数夫——莫斯科守将——有从圣彼得堡得到援兵以压迫巷战工人的可能。广东十二月暴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李福林能够电调韶关军队由粤汉路进攻广州，以致决定了苏维埃政府的命运。涅维尔的九月暴动，未曾准备总罢工，以致发生极不好的结果；暴动对于涅维尔的无产阶级纯粹是“晴天霹雳”，工人阶级对于暴动不曾了解，大部分工人群众不起来参加，以致遭受了失败。广东暴动失败的原因还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它未曾吸收广大的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参加，暴动的社会基础不广大。

根据许多暴动的经验，在暴动前发生了政治的总罢工，其结果则完全与上述各例相反。

上海三月暴动胜利的原因之一，便是铁路工人的罢工，使张宗昌没有运兵到沪去压迫暴动工人的可能。

我们此处列举铁路工人罢工的意义，不过是总罢工意义中之一例，其他如：邮政、电报、电话、兵工厂、财政机关……等等之罢工与占领，意义都极重大。

总罢工的爆发，只有在工人阶级战斗情绪最高之时才有可能，所以总罢工是革命潮流高涨的具体表现；总罢工是动员

工人群众到街上去的最灵活的动力，所以总罢工是调动群众作战的动员命令；总罢工是工人阶级和平斗争的最高形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直接前提。总罢工能破坏敌人，恐吓敌人，沮丧敌人的意志，妨害敌人的力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序幕，是武装暴动的胜利保障。

三、巩固和扩大武装暴动胜利的问题

在一区域或某几区域取得暴动的胜利，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此处还有更复杂的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胜利的问题；换言之，局部和暂时的胜利，如果不能巩固和扩大，则结果一定要失败。所以在暴动胜利后，必须组织能够代表革命利益的新形式的政权（苏维埃），必须很迅速的满足劳动群众生活上急需的要求（衣，食，居住，工作时间，劳动条件，土地……等），必须组织和创造保障革命阶级利益的武力（武装队，赤卫军，红军，人民警察，非常委员会……），必须深入劳动群众中去解释暴动的意义，必须使劳动群众都积极起来拥护、参加、创造、巩固和扩大暴动的胜利，必须用一切力量根本压倒和消灭反革命的反抗。

一九二七年上海胜利暴动的指导者便不会完成这一任务。他们不会组织群众，不会建设真正的革命政府，由几个智识分子所领导的上海市政府，只注意仰大资产阶级的鼻息，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和完全抛弃了多数的城市贫民；在它存在三个星期中，差不多完全没有活动，简直未曾解决革命民众的任何紧急问题。所以当蒋介石公开叛变，大行屠杀胜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上海无产阶级群众时，大部分上海无产阶级和劳动贫民不曾应上海市政府之号召而给反革命以坚决的反

抗。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在彼得堡爆发后，布尔塞维克能够把工人阶级和贫农组织在党和苏维埃的周围，发出使群众都能了解的口号，迅速颁布满足劳动群众急切需要的命令（土地，和平……的命令及宣言），给反革命阶级以各种致命的打击，所以这胜利能扩大到全俄的范围，巩固起坚强的基础。

（二）关于第二点

一、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

“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同上决议）。

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用全副力量全副精神去实行这个决议。并且切实纠正下列三种错误的有害的倾向。

一、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

在目前状况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民主社会党”或所谓“中华革命党”……等）的领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种倾向，也不仅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和不觉悟的工人的心房里

荡漾着这种思想；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员的队伍中有很多数的分子也不免沾染了这种毒素。他们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来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于是就发生以合作社运动向南京政府请愿，组织地方自治机关等为目前运动主要形式的理论。对这些分子的关系，列宁在他论《莫斯科暴动的教训》一文中曾坚决的说道：“谁反对它（暴动——作者），谁不准备干它，就应当把谁毫不留情的从革命同情者的队伍中赶出去，把他赶到革命的反对者、革命的变节者和革命的畏缩者的队伍中去；因为这个日子快要来到了，就是事变的力量、斗争的环境都使我们不能不按这个征号来分别朋友和仇敌了！……”（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五一页）现在在中国从这一问题去分析每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观点是非常必要而且绝对正确的。坚决的反对这种倾向是暴动的指导者，真正同情暴动者及每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任务！

二、儿戏暴动的倾向

“暴动是艺术，无论何时不要以暴动为儿戏呀！”（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从中国各地所得的消息看来，证明我们的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武装暴动策略的根本原则还未曾充分了解。例如：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暴动的政治路线，划河南为若干区域，决定自十月十日至十七日为暴动时期；因为没有把暴动的企图与一般环境及群众情绪相联合，所以这些企图终归完全失败；长沙工作的同志因热衷于未成熟的暴动，遭受极残酷的牺牲；湖北省委曾三次决定在汉口暴动的时日，同时又三次改期；这种冒险倾向引起许多惨酷的破坏，失去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及群众对于本身的自信心。有这种倾向的人创造出绝对冒险的理论基础，他们说：

“在中国现在谈不上什么未曾成熟的暴动”——这理论在中国少共中尤其有很多的势力，形成少共先锋主义内容之一部。每个觉悟的共产党员必须知道：由这种理论基础所产生出来的暴动行动，一定永远遭受失败，因为，即在客观条件对于暴动极顺利的情况下，如果暴动的准备不充分，暴动的指挥者与组织者对于它不慎重其事，没有精详的暴动计划，没有坚强的暴动领导，则暴动的结果还不能免于失败。

“一部分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种儿戏暴动倾向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同志毫无忍耐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客观环境的估计不正确，他们以为可以继续暴动到很久的岁月。每个觉悟的共产党员应当知道：“以儿戏暴动代替工农群众暴动，正是消灭革命的好方法”（同上决议），“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反对以暴动为儿戏”（见上决议）。

三、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

中共中央十一月（一九二七）扩大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上有一条说：“再者，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中，有发生下列各个不正当倾向的可能：（一）军事投机主义，事前明知道要遭受失败，而竟号召群众参加暴动，这固然是军事的投机主义，但这还不算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就是只崇信军事力量、军事准备和军事进攻的计划，而不号召群众，不相信群众，这样在暴动中只见军事行动，而没有充分的群众斗争，这真是机会主义。（二）事前没有准备，而策略上采取观望态度，既不能号召群众，到群众自己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而领袖们还在动摇

不定，甚至于怠工，表示出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态度，不去指导群众，于是断送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在另一条上又说：“……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希望凭藉工农群众，而希望凭藉那靠不住的军队而和军队拉拢（在湖北的西北及湖南，都发现这种企图），这是机会主义政策之馀毒”。这是由于不了解：暴动决不仅是纯粹的军事行动，暴动只有凭藉广大的群众的参加才能得到胜利，暴动如果不凭藉群众运动，而仅仅依靠军事行动，则变成了军事的政变，而并非真正的革命。群众抱旁观态度而不积极参加的军事政变，迟早必遭失败的。群众工作是准备暴动的必要前提，群众工作是一切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二、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上有一条说：“党在指导各地农民自发的游击斗争时，应注意到：只有使这些斗争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浪潮联结的条件之下，才能使这些单独的暴动变为总暴动的出发点。此处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使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内组织与准备这种动作。因此，便须与过于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争斗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这只是说游击斗争必须与工业中心的暴动相联合，必须使这一区的斗争与其他各区同时联络发动，必须慎重把零星的无准备的斗争，准备和组织成广大范围的运动，这绝不是抹杀游击斗争的意义，尤其不是根本反对游击战争。

“当群众运动事实上已发展到暴动，在国内战争的‘大规

模作战”的相当休憩期间，游击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二页）。这种斗争形式的广大应用和发展，在俄国是一九〇六年，即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的暴动失败以后；在中国是在一九二七年秋季至一九二八年，即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叛变以后，特别是在广东十二月暴动失败以后。总而言之，都是在“政治恐慌剧烈到武装斗争的程度，而在城市和乡村中的需要，饥荒和失业又特别加剧之时”（列宁）。“它（游击战争——作者）的发生自有其强有力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无法消灭这种原因，也就无法消灭这种争斗”（列宁）。这就是说，如果在任何地方出乎我们预料之处而自然爆发了游击战争，则我们一定要参加这个斗争，取得这个斗争的领导，把暴动者组织起来，使他们的运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及广大的农民暴动相联系。

游击战争的反对者通常用下列言论作为反对的论据：游击战争是无政府主义、布郎吉主义、恐怖主义，堕落工人道德的行动，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使广大的居民脱离工人的行动，破坏运动和危害革命的行动。

只要某个地方发展着游击战争，就会听见这种论调，在一九〇六年的俄国听到，在现在的中国也同样的听到（“游击运动”是“原始的”、“不觉悟的”、“无组织的”，甚至于是土匪式的运动……等名词）。列宁对于这些自命为“有组织的”、“纪律化的”、“有秩序的”革命斗争的同情者——冒牌的革命家和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给以严重的反驳，“从军事便利的观点出发的对于国内战争的各种形式的批评，我们完全承认和无条件的同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我们对于国内战争的条件的分析，必须毫不采用什么‘无政府主义’、‘布郎

吉主义’、‘恐怖主义’等等的陈腐的和淆人听闻的套语”（《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三页）。我们承认游击战争仅仅是国内战争和革命斗争的形式之一，仅仅是帮助群众运动和准备群众武装暴动的一种斗争形式；游击斗争的目的只是在扑灭某部军警的长官及显著的反革命的急需，破坏敌人的组织，扰乱敌人的后方，恐怖敌人的走狗。我们是这样（仅仅是这样）估计游击斗争的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不以为游击斗争永远只是无组织的、偶然爆发的和个人性质的行动。游击斗争的确有变为“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和使广大的居民脱离工人的行动”的危险，假若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正确的组织和领导这种运动，不能阐明和解释这种运动的意义于广大的群众之前，不能使游击队本身及局外人了解游击斗争在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及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力量；游击斗争的确有盗贼分子、流氓和无政府党人参加，的确有“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危险；然而我们“不知道那里这些花样的斗争工兵，就是他们或者能够建立起一道中国式的万里长城，把比无产阶级高一点或低一点的社会成份和无产阶级完全隔绝起来”（《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二部第八五页）。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应当把它与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光荣斗争衔接起来。谁也不否认游击斗争有时有“破坏运动”和“危害革命”的危险，但是谁也知道：“一切含有新的危险和新牺牲的斗争新形式，不可避免的要‘破坏’对于这个斗争形式没有准备的组织”（前书第八三页）。同时，谁也知道：“无论何种战争的任何军事行动，对于参战的队伍总有相当的破坏”（同上页）。再者，就是“有秩序的”、“有规则的”革命的同情者和游击斗争的反对者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就是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运动被破坏得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游击斗争发展最宽广的西境波兰与那腿世，而是这斗争比较不发展的中部俄罗斯；一九二七年秋季以来，中国革命运动在游击斗争最发展的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的浪涛，始终比其他长江各省及黄河流域的浪涛高。由此，我们的结论是：游击斗争含有许多危险，游击队及进行游击斗争的组织中有时有许多不利于我们的成份参加，但绝不能因此就说游击斗争根本不要了。恰恰相反，游击斗争是必要的，应该整饬队伍，巩固组织，尽一切可能来学习和改良游击争斗。

党的任务就是在于使这种“原始的”，进到“高级的”运动，“不觉悟的”变为“有觉悟的”运动，“无组织的”形成“有组织的”运动。“我们斥责游击斗争，实际上是斥责在暴动行动中我们党的能力薄弱”（同书第八二页）。

“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何时未尝把游击战争看成唯一的或主要的工具；这工具应当服从其它的工具，应当与斗争的主要工具相吻合，应当与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的和组织的影响相联系”（同书八四页）。谁把游击运动看成土匪运动，谁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应当把他从革命的政党和组织中驱逐出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之游击斗争与土匪运动是有天壤之别的！

三、论 土 匪

既然有人把革命的游击运动比作土匪运动，我们便不能不把中国实际生活上的一种宽广的病态现象，即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深恶痛绝而认为“死有余辜”的“土匪”的社会根源，及革命政党对它所应持的态度等略加探讨。中国现在的所谓土匪，内容包括各种不同的成份，它的主要成份是迅速贫